

引文—译文—原文

——借重并评析“一文”和“一书”的两段引文和译文

左少兴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 北京 100871)

提 要: 我们这里说的“引文”“译文”“原文”彼此间有着密切的语言文字关系。无论引文还是译文, 必要时应有相应的注解和“出处”, 引文要精当, 译文要准确, 要忠于原文。

关键词: 引文; 译文; 原文; 俄汉翻译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识码: A

1 引子

所谓“一文”, 是指《中国俄语教学》(下简称“该刊”) 2016年第4期上发表的一篇学术论文《为他人建构的话语——普京演讲的对话性》(下简称“该文”); 所谓“一书”, 则指“该文”引例(译文)的出处——即刘圆媛、姬丽娟两位老师编译的《王者归来: 普京的魅力演讲》(下简称“该书”)。

我们所说的“该文”和“该书”的两段引文都采用了俄汉双语对照形式, 因此, 所有“引例”既有译文, 又有俄语原文(见下面详细列出)。

引文—译文—原文彼此间有着密切的语言文字关系。常言道: 译文要做到“信达雅”, 要“忠实于原著(原文)”; 此外, 引文要力求引用“准确”、“完整”, 与全文或全段相适等等。从学术规范的角度而言, 无论是引文, 还是译文(除非是自己译的文字)以至外语原文, 都必须有来源, 必须确实可靠。不仅如此, 正如北京师范大学伍铁平和王进二位学者所提出的: “引用他人译文时, 应核对原文。译文的错误不应沿用不改。”(伍铁平等 2007: 17) 所谓“核对原文”——这是对通晓该外文的译文引用者而言的。但是我们仍不时见到, 译文引用者(即使通晓该译文的原文)有时也不慎连同“译文的错误”一起引用。

笔者再次认为, 必须强调引文(引用的原文和译文)注明出处的必要性, 这是学术规范的要求。新世纪初年, 许多高校和学术研究机构都制订了学术道德规范条例, 其中就有这样的规定: “在作品中引用他人的成果, 必须注明出处”, “从他人作品转引第三人成果, 应注明转引出处”等。(北京大学社会科学部 2005: 7)

就以本文“借重并评析”的“该文”而言, 它在文末的注释中就写明: “1. 以下演讲译文均引自刘圆媛、姬丽娟, 《王者归来: 普京的魅力演讲》[M], 北京, 中国宇航出版社, 2012.” [该刊第60页]但这注释中只说明“译文”的出处——“均引自”该书。很遗憾, “该文”却没有明确指出: 该文中与“译文”并列(同时引用)的俄语原文, 是否也出自该书?

因此，我们只得既“使用”该文，也“利用”该书。因为两者的译文和原文大致是相同的，尽管两者之间还有些许差异。[见下面谈到的“引例二”]

我们秉着“文责自负”、“责有攸归”的精神，对引文、译文和引用的原文及其使用者，提出我们初浅的看法。

2 两个“引例”——第一个“引例”

“该文”全文共有 12 个这样的“引例”。下面我们对其中两个“引例”分别加以评析。两个“引例”（原文和译文）均在该刊第 59 页上。

引例一：

“Великий Конфуций говорил: из Благородного человека не сделаешь орудия. Заметьте, как созвучна эта мудрость словам Достоевского о том, что красота спасет мир. И в России, и в Китае классиче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всегда играет особую роль в укреплении нравственных, моральных основ общества. (同上)”

“伟大的学者孔子曾经说过，‘君子动口不动手’。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曾经说过，‘美可以拯救世界’。无论是在俄国还是在中国，古典文学在加强社会思想道德的基础方面起着特殊的作用。(同上)”

无论是俄语原文还是汉语译文，也无论是“直接引语”还是“间接引语”，它们的出处在“该文”中都用“同上”二字代替。那么，“同上”是什么意思呢？按“该文”所写，是《Выступление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и В. Путина на траурном приеме после прощания с первым президентом России Борисом Николаевичем Ельциным》和《俄罗斯总统弗·普京在首任总统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叶利钦追悼会上的致辞》——以上双语的文字均在该刊第 58 页上。

但是，当我们再将“同上”的两个出处向《王者归来：普京的魅力演讲》求证时，发现上面的俄语原文和汉语译文均在另一篇演讲辞（第 12 篇）上，其篇名是：《Председатель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России В.Путина принял участие в церемонии открытия Года китайского языка в России》和《俄罗斯总统弗·普京出席俄罗斯汉语年开幕式并讲话》（两者的全文均在“该书”第 67—74 页上）。

读者看到，一个是追悼会上的悼辞，另一个是“汉语年”开幕式上的祝辞，只用两个“同上”二字来代替实际出处——因此“出错”！这说明注解不实，不过有时的确难以避免。

但是我们对“该文”引例的评析不在“同上”二字上，而是在它的引文、译文以及引用的原文上。

“引例一”的问题在哪里？

引例的译文和原文，在“该文”与“该书”是完全相同的。但尽管如此，我们认为译文在某些方面仍有不足，值得商榷。例如，两者都没有译出原文有的词句：“Заметьте, как созвучна эта мудрость словам Достоевского о том, что красота спасет мир.” [我们代试译：“请注意，这些睿智之言同陀思妥耶夫斯基说的‘美能拯救世界’的论点是多么协调一致”]；再如，两者都将“Великий Конфуций говорил: «из Благородного человека не сделаешь орудия»”译为“伟大的学者孔子曾经说过，‘君子动口不动手’……” [分别在“该书”第 72 页和该刊第 59 页]笔者认为，孔子不仅是“学者”，主要还是思想家、政治家、哲学家和儒家学说的创始人。

读者怀疑，孔子说过“君子动口不动手”这句话吗？它出自儒家学说的哪部经典？有网

友曾向百度提问：“君子动口不动手”是谁说的？“百度知道”上有人答曰：“君子之语多出自儒家学说，但儒家中也只是说君子规范，并没有直接说出‘君子动口不动手’……”[笔者注：这段话是网友给我们下载的]

中国新闻社驻莫斯科记者田冰先生于2010年3月24日发出“中新社莫斯科3月23日电 题：习近平[笔者注：当时还是国家副主席]、普京旁征博引妙解‘汉语年’”。这位在场聆听过普京演讲的中国记者写道：“他（指普京总统）又援引孔子‘君子不器’的话说，我们注意到，这句话与陀思妥耶夫斯基说的‘美丽拯救世界’含义非常契合……”。这些话显然译自当时的普京演讲。值得注意的是，这位记者把“Из Благородного человека не сделаешь орудия”译为“君子不器”，而不是什么“君子动口不动手”。

“君子不器”这句话出自《论语》“为政篇第二”。杨伯峻先生在《论语译注》中解释：“子曰：‘君子不器’（一）。”“[译文]孔子说：‘君子不像器皿一般，（只有一定的用途。）’”“[注释]（一）古代知识范围狭窄，孔子认为应该无所不通。后人还曾说，一事之不知，儒者之耻。虽然有人批评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见《论语·子罕篇》]，但孔子仍说‘君子不器’。”（杨伯峻 2005：17）

令人感兴趣的还有：“该书”编译者在“难点解析”中写道：“⑦Из Благородного человека не сделаешь орудия 此句为孔子名言，意为‘君子动口不动手’，有时也译为‘Благородный человек – не орудия’。”（王者归来：普京的魅力演讲：74）

对此“解析”我们还得再问两句：既然是“孔子名言”，那它的出处何在？既然“有时也译为……”，那它的译者是谁？（这里应是哪位俄国汉学家译出的？）

“该文”为了说明“对话性”中“‘主体—主体’关系”，对所引用的例子进一步阐释道：“通过例③[指上面的引例]可以看出，说话人[笔者注，这里指普京总统]选择特别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即，‘孔子’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对社会思想道德的观点，并让其直接对话，得出的观点更具权威性，更易为受话人所接受。”[该刊第59页]

我们在本文前面曾对所谓“君子动口不动手”当作“孔子名言”表示怀疑。现在“该文”作者又把这句话当作孔子的“更具权威性”的观点，就更让我们“找不着北”了！

北京大学中文系老一辈研究孔孟儒家思想的杨伯峻教授在其《论语译注》的“试论孔子”[笔者注：相当于该书“代序”]中对“孔子身世”、“孔子思想体系的渊源”、“孔子论天命、鬼神和卜筮”、“孔子的政治观和人生观”、“关于忠、恕和仁”和“孔子对后代的贡献”等，作了全面而深刻的论述。杨伯峻先生特别强调：“仁是孔子的最高道德标准”，“他的思想核心是仁”；孔子“热心救世”的思想和行动是他的政治观和人生观的表现。孔子在《论语》第一篇“学而篇”就提出了自己的“论世”的主张：“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等等。特别是孔子在其中谈到的“泛爱众”——一种“大爱无疆”的说法，是一种“博爱大众”的精神。这些以“仁”为本的“泛爱众”与十九世纪俄国某些作家主张并推行的“基督精神”或者所谓“用基督精神去救世界”的“博爱”（“爱一切人，一切物”）精神，颇有某些共同之处。著名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所谓“美可以拯救世界”，实则用“爱”的精神——博爱“可以拯救世界”。我们粗浅地认为，或许这些才是孔子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对社会思想道德的观点”。

对于我们外语专业的学人来说，如果要从以孔孟等人为代表的儒家学说和儒家经典中“引经据典”，最好的办法是向研究古汉语、古文献的专家学者及其著作请教。

3 第三个“引例”

“该文”原文：“И Есенина будем помнить, будем помнить все наше величие. Так вот,

помним эти слова: «Умремте ж под Москвой, как наши братья умирали! И умереть мы обещали, и клятву верности сдержали мы в Бородинский бой.» (Выступление В.Путина на митинге в Лужниках в 2012 году)” [该刊第 59 页]

“该文”译文：“我们将记住叶赛宁，我们将记住我们所有的丰功伟绩。我们来重温一下这些诗句吧：“我们将为莫斯科而捐躯，如同我们的兄弟为国牺牲！我们许下诺言血洒战场，我们兑现了效忠誓言！”（2012 年弗·普京在卢日尼基集会上的讲话）[该刊第 59 页]

照“该文”所说：“……演讲译文均来自‘该书’”。下面我们将“该书”的相应“译文”照样抄上：

“译文”：……我们将记住叶赛宁，我们将记住我们所有的丰功伟绩。我们来重温一下这些诗句吧：“我们将为莫斯科而捐躯，如同我们的兄弟为国牺牲！我们许下诺言血洒战场，我们兑现了效忠誓言！” [“该书”第 22 页]

这里的“译文”几乎完全相同（除了用词“效忠”和“忠诚”稍有差异外）。但是两者的“原文”如何呢？下面我们照“该书”直抄。

该书“原文”是：“...И Есенина будем помнить, будем все помнить наше величие. Так вот, вспомним эти слова: «Умремте ж под Москвой, как наши братья умирали! И умереть мы обещали, и клятву верности сдержали.»” [“该书”第 22 页]

我们可以看到，两个“原文”除个别标点和 все 的位置不同以及动词 помним 和 вспомним 不同外，最突出的是“该文”有“в Бородинский бой”这个词组，而“该书”却无。此外，“该文”虽有这个词组，但却没有相应译文。

从这段文字我们还注意到：“引文—译文—原文”这个“系列”中可能还含有另外的“系列”：“原文”中有自己的“引文”（我们在这里指的是引用的诗句）和“译文”（如果译成别的语言）。

如前所说，无论是“引文”还是“译文”或“原文”，引用者都应该注明相关“引语”的出处。因此，我们对“该文”和“该书”中引用的诗句出自哪位俄国诗人笔下一就得追问一下。其实，“该书”写得很明白“普京的演讲”是在 2012 年，适逢 1812 年俄国人战胜拿破仑法国侵略军的“波罗金诺”战役 200 周年，“该书”在“И Есенина будем помнить...” 这些文字之前还有普京在集会上的讲话：“В этом году[笔者注：指 2012 年] мы будем отмечать 200-летие со дня Бородинской битвы, и как не вспомнить Лермонтова и его Чудо-богатырей? Мы помним эти слова еще с детства, со школы, помним этих воинов, которые перед битвой за Москву клялись в верности отечеству, и мечтали умереть за него. Помните, как они говорили?...” [笔者注：接下去才是«И Есенина помним...»][“该书”第 22 页]

同页上的译文是：“今年我们将举行博罗季诺[笔者注：地名 Бородино 还译为“波罗金诺”]战役 200 周年的纪念活动。这怎能不让人想起莱蒙托夫和他的‘神奇的勇士’。小时候我们在学校里就记住了这些诗句，记住了这些在莫斯科保卫战前夕宣誓效忠祖国并甘愿为祖国献出生命的战士们。还记得他们是怎么说的吗？……”

“还记得他们是怎么说的吗？”——当时普京总统在演讲中问道，但随着就是“我们将记住叶赛宁……”我们认为，这里加进的这一句话（不像是俄语句法中的“插入句”或其他）似乎与整段演讲辞无必然关联。我们不知道，1895 年出生的诗人叶赛宁是否也写过关于 1812 年波罗金诺战役的诗作。但演讲辞中“嵌入”的这颇似“即兴”之言的一句话，反而给人造成这些诗句出自叶赛宁笔下的印象，如果引用者不加注意或者误解误读的话。

果不其然，“该文”中就如此。文中写道：“……可以看出，直接引语‘我们将为莫斯科捐躯，如同我们的兄弟为国牺牲！我们许下诺言血洒战场，我们兑现了效忠誓言！’是诗人叶赛宁广为人知的诗句，说话人[笔者注：这里是指演讲人]对此表示赞同。同时，将自己置于叶赛宁的阵营，使受话人[笔者注：这里是指出席大会的听众]认同说话人的观点。”

“该文”中的这段议论让人不由得想起了前辈学者钱钟书先生的感叹之言：“你不说，我倒清楚，你越说，我反而越发糊涂。”（刘玉才等 2001：2）

普京演讲中说的“我们来重温一下这些诗句吧！”的“这些诗句”，出自诗人莱蒙托夫的《波罗金诺》这首诗。

1837年，时年23岁的诗人莱蒙托夫(1814-1841年)在波罗金诺战役(Бородинская битва)胜利25周年之际，写出饱含深情的《波罗金诺》(Бородино)这首诗。此诗共有14节，第9节诗行便是：

“И молвил он, сверкнув очами:
«Ребята! Не Москва ль за нами?
Умремте ж под Москвой,
Как наши братья умирали!
И умереть мы обещали,
И клятву верности сдержали
Мы в Бородинский бой.»” (Лермонтов 1986: 44—45)

下面我们借用著名翻译家顾蕴璞教授翻译这首诗的第9节诗行：

“当时他目光炯炯地说道：
‘弟兄们，后面不是莫斯科吗？
让我们战死在莫斯科城下吧，
像弟兄们那样把热血抛洒！
我们誓以决死为国报效，
我们在波罗金诺的战役中，
履行誓言肝胆照！’”（顾蕴璞 2006：125—129）

这里诗行中的“他”是指俄军统帅米·伊·库图佐夫(М.И. Кутузов)，他当年指挥俄国军队，在莫斯科附近及周围地区打击拿破仑皇帝亲自率领的法国侵略军。我们在《波罗金诺》(Бородино)中读到的诗行“Умремте ж под Москвой, Как наши братья умирали!”的译文(“让我们战死在莫斯科城下吧，像弟兄们那样把热血抛洒!”)比“该书”及“该文”的译文(“我们将为莫斯科而捐躯，……”)不仅更符合原文，而且也更符合史实。当拿破仑率领的法国军队占领莫斯科城——一座被焚毁、居民被撤离的“空城”时，俄军统帅库图佐夫在一次在莫斯科郊外召开的军事会议上说：“С потерей Москвы – не потеряна еще Россия.” (Сыров 1987: 141)。我们试译：“莫斯科虽失，仍有俄罗斯。”可见不是“为莫斯科而捐躯……”当年那些在战场上英勇牺牲的“创造奇迹的勇士—战士们”是“为自己的祖国”而战，为整个俄罗斯而血洒疆场。当年的 Москва 还不是后世的作者们当作的 Отечество (Вся Россия) 的“代用词”。

4 值得一读“该书”和“该文”

我们完全同意三位学者(刘光准、夏忠宪、刘文飞)在《王者归来：普京的魅力演讲》这本书的封底上的题词，以及对“该书”的译文和原文所作的精彩的语言文字评价。对于俄语读者来说，又正如“该书”封面所写：“聆听普京演讲，学习地道俄语。”“该书”既采用俄汉双语对照形式，又附赠 mp3 光盘供读者提高听力之用。我们十分赞赏两位编者(也称

“编译者”)下的功夫和这本辛劳之作。

特别难能可贵的是,“该书”编译者为读者正确理解原文着想而对演讲中的某些词语作了词汇—语法和文化国情知识的“难点解析”。正如鲁迅先生在《花边文学》中所说:“难解之处,忠实的译者往往会有注解,可以一目了然,原书上倒未必有……”(《翻译研究论文集》【1894—1948】,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鲁迅:《花边文学》。)

鲁迅先生的这些话,不仅对译者适用,就是对译文和外语原文的引用者也是适用的。但我们有时看到,某些文章作者或者忽视必要的注解,或者为“回避”某些“争议”或“难点”而放弃注解。

让我们回到上面谈到的两个“引例”。例如“引例一”的“Из благородного человека не сделаешь орудия。”—无论从词法(如 орудия 的数和格)还是句法(谓语的表现形式和句子结构),都有可注解之处;这句俄语(译文)出自哪位俄国汉学家笔下,所谓“君子动口不动手”(如果中国经典中有这句话)的出处何在等等都被忽略!

再如“引例二”中(“该书”漏掉的和“该文”未译的)“Мы в Бородинский бой”很有注解的必要。

有些读者曾对“в Бородинский бой”(第四格形式)提出质疑,认为该用“в Бородинском бою”(第六格形式)。难道普京总统也犯了语法错误?否!普京总统在这里没有错,而读者的提问也是“应该”的,演讲中引用的出自诗人莱蒙托夫笔下的这个诗句也是正确的。

普京总统“早在 2001 年四五月间就一再强调,要运用法律手段,对讲出脏话和犯下俄语语法错误的国民进行惩罚,同时还禁止国民在说话时滥用外来词”(赵爱国等 2006: 258)。

俄国伟大诗人普希金曾经说过,容许诗人在其诗作中写出像是“语法错误”的形式。他把使用这类形式称作“поэтическая вольность”。在《俄汉大辞典》中,这个词组被解释为“诗中不合语言规范的现象”(224),还被解释为“诗歌中允许出现的语言变通现象”(第 1701 页)。我们认为,两种解释都可以成立。

我们知道,俄语诗歌中除讲究诗行的用词、音节数量、重音特点等外,特别讲究韵律。例如:“Умремте ж под Москвой,(六个音节,诗行韵脚-ой) ... Мы в Бородинский бой.(六个音节,诗行韵脚也是-ой)”

因此,“Мы в Бородинский бой”这个所谓“不合语言规范的现象”在《波罗金诺》这首诗中是被允许的。—这就是我们的“解析”。

我们在上面谈到,引文的正确与否,与译文有一定的关系;译文有错,引文“跟错”,这样的事例并不鲜见。译者有责,引用者也有责,如果后者对引文之纰漏不加“自纠”,不加注释和不加说明的话。

但是,对于引用的外语原文(即著作中的词句)是否也可能存在疏漏、缺陷和不足之处呢?我们认为,回答应是肯定的。由于外语原著作者的文化水平、受教育程度和语言文字修养及所处的时代、环境等的不同,差错失误在所难免。不过有时候我们难以断定:“文责”谁负?

例如,我们在 Н. В. 果戈理的《Ревизор》(第二幕第三场)的人物对话中读到:

“Слуга. Соуса нет.

Хлестаков. Отчего же нет? Я видел сам, проходя мимо кухни, там много готовилось. И в столовой сегодня поутру двое каких-то коротеньких человека ели семгу и еще много кой-чего.[比较规范的是 двое людей]”

“(译文) 仆人: 没有调味汁了。”

赫列斯塔科夫: 为什么没有? 我路过厨房时亲眼看见, 那里准备了许多吃的。今天一大早, 餐厅里就有两个矮胖的家伙在吃鲑鱼, 还有许许多多其他吃的东西。

我们不明白这(语法)“错误”(即上面引文中的划线词)产生的原因, 是不是作者(果戈理)故意让赫列斯塔科夫这位彼得堡来的冒充钦差大臣的小官吏这样说的? 这是否也是一种语法错误?”(左少兴 2006: 159)严格说, 类似“двое...человека”这类词汇—语法错误, 对于译文没什么影响, 但必须说明(尤其在学术论著中引用的话)。

5 结束语

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 2004 年 6 月第一次全体会议讨论通过的《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学术规范》(试行)中关于“学术引文规范”曾有这样的规定:“学术论著应合理使用引文。”对已有学术成果的介绍、评论、引用和注释, 应力求客观、公允、准确。”(2005: 9)所谓“合理引用”、“表达准确”, 对于原文、译文和引文来说, 都是同样要求的。这种“准确”应包括引文、引语的完整性, 切忌“断章取义”。我们在本文前面指出的“该文”把莱蒙托夫的诗句—普京在演讲中提到童年起就记住了的诗句, 当成了“诗人叶赛宁广为人知的诗句”, 这是引文使用不准确、引用不完整的表现。

但是, 尽管如此, 对于“该文”和“该书”的整体来说, 仍然是瑕不掩瑜的。让笔者引用刘光准教授在“该书”封底上的一句话:“喜欢俄语的读者, 快来听读这本好书吧!”不过笔者还想在本文结束时, 在“快来听读这本好书吧!”的后面加一句: 快来研读这篇值得一读的文章(“该文”)吧!

参考文献

- [1] М. Ю. Лермонтов.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4 томах [M]. Том 1. Москва: Правда, 1986.
- [2] С.Н. Сыров. Страницы истории (книга для чтения на русском языке) [M]. Москва: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1987.
- [3] 北京大学社会科学部编. 北京大学教师学术道德规范[S]/学术道德规范(资料汇编) [S]. 2005.
- [4] 顾蕴璞译. 莱蒙托夫抒情诗全集[M]. 北京: 译林出版社, 2006.
- [5] 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编. 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学术规范[S]/学术道德规范(资料汇编) [S]. 2005.
- [6] 刘玉才, 刘宁, 顾永新. 中国文化史纲要[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 [7] 伍铁平, 王进. 正确的翻译是从事学术研究的前提[J]. 三湘评论, 2007(6).
- [8] 杨伯峻. 论语译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5.
- [9] 赵爱国, 王仰正, 周民权. 俄罗斯概况[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6.
- [10] 左少兴. 俄语的数、数词和数量词研究[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 [11] 俄汉大词典. 黑龙江大学俄语语言文学研究中心/辞书研究所编.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3.

Citations — Translations — Originals

— A Critical Evaluation of Two Citations and Two Translations in The Paper and The Work

Zuo Shao-xing

(Beij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The “citation”, the “translation” and the “original” that we are talking about here are closely interwoven. Whether it is the citation or the translation, there should be corresponding comments and “sources” attached if necessary. The citation should be concise and pertinent, and the translation should be exact and true to the original.

Key-words: Citations; Translations; Originals; Russian-Chinese Translation

作者简介: 左少兴（1930—），江西永新人，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俄语语言文学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俄语语言文化学，古代俄罗斯文学。

收稿日期: 2018-03-14

[责任编辑: 信 娜]